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詹新宇,白晨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结果表明:(1)从总体上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显著为正,即它加剧了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2)从分地区来看,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而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则显著为正。(3)将转移支付划分为一般性、专项和返还性三类,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别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返还性收入则扩大了经济发展差距,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4)从不同类别的不平衡指数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中部地区的组内发展不平衡程度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组间发展不平衡程度,缩小了西部地区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关键词] 转移支付;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系统GMM估计;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公共服务;“挤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 F810.4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19)03-0092-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飞跃式增长,但它并没有平等地惠及所有地区和所有国民,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财政分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财力均等化、缩小地区差距以及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研究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因应关系更具有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主要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分解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两个角度进行了有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测度及分解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法、泰尔指数分解法、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法来量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并进行成因探析。周喆利用基尼系数分解法测算了1989—2008年中国省区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发现基尼系数在此期间增长了30%左右,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不断加深^[1]。高帆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了我国1978—2009年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同时对泰尔指数进行空间分解,测度了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组内和组间差距^[2]。根据洛伦兹曲线测算出的基尼系数虽然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经典指标,且可以将总收入差距进行组内差异、组间差异和组间重叠三部分的分解,但实际上这种分解会因组间重叠造成严重的估计误差^[3]。基于基尼系数的这种缺陷,众多学者开始使用泰尔指数对发展不平衡进行分解,然而泰尔指数法尽管在

[收稿日期] 2018-09-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603281)

[作者简介] 詹新宇(1981—),男,安徽太湖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理论与政策,邮箱:zhanxygl@163.com;白晨曦(1994—),女,河北邢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效应量化评估。

空间分解上较基尼系数更优,却难以满足双重分解的需要,不能将产业分解和空间分解有机结合起来对发展不平衡进行分析^[4-6]。Akita和Miyata提出的基于空间与产业二重分解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可以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同时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做空间分解与收入来源分解,突破了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限性^[4]。覃成林等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法分析了导致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变化的空间原因和产业原因以及二者的耦合作用^[7]。陈长石等基于“中心—外围”模型思想及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对广东、辽宁等七个省区市的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了测度,并从空间和产业两个角度做了分解^[8]。二是采用经济模型分析收敛性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Rasier对1978—1992年各省区市经济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9]。刘生龙等基于1985—2007年省级数据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绝对 β 收敛和条件 β 收敛进行了检验,并证明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俱乐部式”收敛特征^[10]。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因素方面,陈长石等认为金融市场化的“规模”效应提高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效率”效应降低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并且“规模”效应大于“效率”效应,整体上金融市场化提高了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11]。周喆对人均GDP、国内资本存量、贸易开放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和教育水平等因素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进行了探究,发现仅有教育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抑制地区间差距扩大的作用^[1]。陈长石等通过对最优产业结构的测算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分解,系统讨论了产业结构偏离对省级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微观机理,发现产业结构偏离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12]。

从既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从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及财力均等化效应、对地方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等几个方面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效果进行了探究。赵建国等利用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有着显著影响^[13]。贾晓俊等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研究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能起到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但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大^[14]。付文林等研究发现,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不仅会带来地方财政支出的“粘蝇纸”效应,而且随着转移支付规模的扩大,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提高基建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支出,可能会偏离转移支付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目标^[15]。马光荣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均正向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但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增长效应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16]。钟辉勇等和胡祖铨等分别从转移支付对地方债务的影响、地方征税努力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17-18]。宋小宁认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基于政治平衡和经济平衡的考量,而非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因素^[19]。吴永求等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税收返还的资金效率高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效率^[20]。

在对转移支付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国际文献方面:Cashin认为,1961—1991年间印度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补助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收敛,并且转移支付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经济富裕地区^[21];Dias等就葡萄牙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财政效果进行评估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没有改善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2]。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转移支付与城乡差距的关系,如雷根强等研究发现,转移支付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3]。二是转移支付与地区发展差距的关系,如马拴友等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促进各省域之间经济的收敛^[24];江新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转移支付及各分项转移支付在省域经济绝对收敛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总的转移支付并没有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反而在地区间的分布存在“马太效应”^[25];张楷浠运用 β 收敛对转移支付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转移支付在东部和西部地区确实起到了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而在中部地区这一效果并不明显^[26]。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考察转移支付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系方面,更多的是借助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收敛概念,通过回归分析来估计转移支付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作用,而尚无文献利用衡量地区经济不平衡的指数与转移支付的回归模型来直接探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拟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对2000—2016年各省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测度,同时采用“中心—外围”空间分解方法对省域发

展不平衡指数进行一重分解,计算出中心、外围城市之间以及中心、外围城市内部的不平衡指数,就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二、理论分析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为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改善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以及区域财政之间的横向不平衡状况,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应运而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从1995年的2530.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58030亿元,绝对量增长了近20倍,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间转移支付主要由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组成,这三类转移支付的主要职能不尽相同。

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主要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和原体制补助(定额补助)两个子项目,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的核定公式为:

$$ET_i = TET \times \frac{SE_i - SR_i}{SE - SR} \quad (1)$$

其中, ET 表示均衡性转移支付,属于一般用途转移支付; TET 表示在预算年度内中央政府可用于 ET 的资金总额; SE 表示标准财政支出; SR 表示标准财政收入; $SE_i - SR_i$ 表示某省区市标准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差距,一般被称为标准财政缺口, $SE - SR$ 则表示全国所有省区市加总的标准财政缺口。因此,各省区市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的多少取决于其标准财政缺口的大小。标准财政缺口与均衡性转移支付呈正向关系,即缺口越大的省区市,获得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就越多,反之亦然,不存在财政缺口(标准财政支出小于标准财政收入)的省区市将无法获得均衡性转移支付。同均衡性转移支付一样,原体制补助数额的核定也是基于各省区市财政收支的缺口,旨在弥补财力匮乏省区市的财政缺口。

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的目的不同,专项转移支付的目的在于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实行专款专用,主要包括除均衡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外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除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原体制补助外,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组成部分还包括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增加工资补助等,这些子项目多在国家出台重大政策时,为了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指定用于与政策相关的项目上。以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为例,从2001年开始,为规范农村税费支付,遏制对农民乱收费、乱集资等情况,中央提出对现行农村税费制度进行改革,但此政策的实施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因此国家对于地方净减收部分给予适当补助,即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总额中占很大的份额,它是与一般性转移支付相对应的概念。专项转移支付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专款专用,主要功能是补充地方政府在特定公共支出项目上的财力,主要用于科教文卫、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

税收返还则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2年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2009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之后,为确保地方政府既得财力和分税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而推出的一种政府间转移支付形式,它是以税收优惠的形式给予地方一定补偿^①。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是以1993年为基期核定的,在此以增值税和消费税返还为例,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通过以下公式核定:

$$TR_{1994} = (CT + 0.75 \times VAT)_{1994} - S_{1993} \quad (2)$$

其中, TR 是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 CT 、 VAT 分别为消费税和增值税; $(CT + 0.75 \times VAT)$ 表示地方政府上划给中央政府的两税收入, S 表示中央政府在基期(1993年)对地方政府的下划收入,地方政府上划的两税收入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下划收入缺口即为基期地方政府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并将此缺口作为

^①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1994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在1994年数额的基础上,税收返还将按照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0.3系数逐年递增。

作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目的在于协调各地区财力、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而且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基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和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而产生和发展的。首先,基于财政分权理论,在许多国家,地方政府在收入支出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财政职能,我国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央财政危机拉开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序幕,分税制改革成功缓解了中央的财政危机,但也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纵向财政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重大幅上升,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不到一半,却承担着支出责任的四分之三。其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这意味着各地区的财政预算收入规模相差悬殊,即存在区域之间的横向不平衡。由于财源分布不均衡,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的财政预算收入要比落后地区多得多,而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更加优质,从而可能进一步加剧横向不平衡程度。政府间转移支付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资金,而公共服务环境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落后地区吸收发达地区技术的能力,在物质资本存量和技术溢出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经济追赶效应,从而实现了地区经济收敛。政府间转移支付向落后地区的倾斜有效弥补了落后地区的财力缺口,提高了落后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以及各地区之间财力的不平衡使得政府间转移支付成为财政资源重新配置,以期达到纵向和横向均衡的重要手段。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定

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然变化,当期的发展不平衡程度必然会受到上一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加入发展不平衡滞后项的动态面板模型,将转移支付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动态面板模型设定如下:

$$CV_{it} = C_0 + \alpha_1 CV_{it-1} + \alpha_2 PCT_{it} + \alpha_k \sum X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CVW_{it} = C_1 + \beta_1 CVW_{it-1} + \beta_2 PCT_{it} + \beta_k \sum X_{it} + \varphi_{it} \quad (4)$$

$$CVB_{it} = C_2 + \gamma_1 CVB_{it-1} + \gamma_2 PCT_{it} + \gamma_k \sum X_{it} + \eta_{it} \quad (5)$$

其中, i 表示省份, t 表示时间, CV_{it} 是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衡量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指数,包括地区内发展不平衡 CVW_{it} 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CVB_{it} ; X_{it} 代表模型中若干个影响发展不平衡程度的控制变量; ε_{it} 、 φ_{it} 和 η_{it} 分别是各模型的误差项。

由于上述模型中均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且一些解释变量与地区发展不平衡指数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从而可能导致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为了得到无偏和一致估计量,我们将采用Blundell和Bond提出的系统GMM方法^[27]。同时,考虑到系统GMM估计适用的条件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及残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问题^[28],本文将分别采用Sargan和AR检验来判断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和残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问题。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发展不平衡指数(CV_{it})为本文的关键变量。学术界较多使用基尼系数分解法、泰尔指数分解法、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分解法来量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由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能够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做空间与产业二重分解,突破了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衡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限性,在学术界广为使用,因此本文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对2000—2016年各省区市的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测度,同时采用“中心—外围”空间分解方法对省级发展不平衡指数进行一重空间分解,得到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指数(CVB_{it})及中心、外围城市内部的不平衡指数(CVW_{it})。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对全

国22个省区市^①的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测度。从测度结果来看,2000—2016年各省区市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先上升后逐步下降;广东的发展不平衡指数最高,黑龙江和甘肃则分别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中最高;东部各省区市发展不平衡指数的离散程度较中部和西部地区高,除广东、江苏外,东部各省区市的发展不平衡指数相对较低。

2. 核心解释变量(PCT_{it})。

本文使用各省区市的人均转移支付来衡量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的力度。在实证分析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时,采用马光荣等的分类方法^[16],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CPCT_{it}$)、专项转移支付($ZPCT_{it}$)和税收返还($FPCT_{it}$)三部分,分别考察它们的经济不平衡效应。

3. 控制变量。第一,参考新古典增长模型控制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实证研究经济增长中使用最广泛的生产函数形式,同时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将其设定为 $Y(t)=A(t)K(t)^\alpha[L(t)H(t)]^{1-\alpha}$ ($0<\alpha<1$),其中 $Y(t)$ 为总产出, $A(t)$ 为技术水平, $K(t)$ 为物质资本存量, $L(t)$ 为劳动力数量, $H(t)$ 为全社会人力资本存量。我们将各省区市的技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及人力资本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1)物质资本存量(K),本文采用单豪杰计算得到的2000年各省区市的资本存量作为基数^[29],以各省区市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各年度的投资,通过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各省区市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2)劳动力数量(L),以各省区市年末社会总就业人数表示。(3)人力资本存量(H),借鉴樊纲等关于人力资本的测算方式^[30],以各省区市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将总人口根据受教育程度分为五类(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并赋以一定的教育年限(文盲0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和中专12年、大专及以上16年)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到。(4)技术水平,以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计算时所用的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及人力资本存量与上文一致。第二,参考周喆的研究^[1],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人均GDP($PGDP$)和产业结构(IS),采用各省区市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IS)来反映产业结构。同时,为了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分省区市的GDP平减指数将各项指标都调整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价格水平。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全国层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

本文首先从全国层面考察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同时为了检验该效应的稳定性,我们通过逐步加入不同方面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研究。模型(1)只含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和中央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含义
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	CV_{it}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计算不平衡指数
	CVB_{it}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计算组间不平衡指数(即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不平衡指数)
	CVW_{it}	基于中心—外围模型,按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计算组内不平衡指数(即中心、外围城市内部的不平衡指数)
转移支付	PCT_{it}	各省区市中央转移支付收入/各省区市年底常住人口总数
	$CPCT_{it}$	各省区市中央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各省区市年底常住人口总数
	$ZPCT_{it}$	各省区市中央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各省区市年底常住人口总数
	$FPCT_{it}$	各省区市中央返还性收入/各省区市年底常住人口总数
物质资本	K_{it}	通过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各省区市每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	H_{it}	各省区市各类受教育程度(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人数与受教育年限(赋值为0、6、9、12、16)的乘积/各省区市总人数
全要素生产率	TFP_{it}	通过索洛余值法计算得到
劳动力	L_{it}	各省区市年末社会总就业人数
产业结构	IS_{it}	各省区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各省区市GDP
经济水平	$PGDP_{it}$	各省区市人均GDP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官网、各省区市财政局官网以及各省区市统计年鉴。

^①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计算各省区市的发展不平衡程度时,要求各省区市每年至少要有4个所辖地级市的数据,因此本文所选样本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4个直辖市以及所辖地级市数据严重缺失的青海、海南、新疆、宁夏、西藏5个省区。

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模型(2)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资本存量(K_{it})和劳动力数量(L_{it})两个关键因素,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人力资本(H_{it})和代表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TFP_{it}),模型(4)进一步加入人均生产总值($PGDP_{it}$),模型(5)则在模型(4)的基础上衡量产业结构(IS_{it})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

根据模型(1)至模型(5)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一直显著,说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确实具有明显的持续性特征,当期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在上一期的基础上变化。另外,所有回归结果均通过了AR(2)和Sargan检验,满足了系统GMM的适用条件,说明模型设定合理。模型(1)仅检验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PCT_{it})的系数显著为正。模型(2)至模型(5)中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尽管转移支付的系数有所减小,但仍然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且该正向影响比较稳定。用来缩小地区差距以及平衡经济发展水平的转移支付没有发挥作用,反而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这违背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设立的初衷,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转移支付在地区间的分布具有“马太效应”,越富裕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越多。另外,这也可能与我国转移支付的形式有关,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较大,但通常限定了具体的资金用途,且大部分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从而导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没有起到均衡地区发展的作用。

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有一定的影响。模型(2)中资本存量水平(K_{i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劳动力水平(L_{it})的系数则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显著的扩大作用,劳动的显著性水平小于资本,这可能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靠资本和技术驱动,单纯依赖人口红利来获取经济增长的方式越来越不可行有关。模型(3)中加入了人力资本水平指标(H_{it})与技术水平指标(TFP_{it}),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则在5%的水平上正相关。从模型(4)的估计结果来看,加入人均生产总值($PGDP_{it}$)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之间的关系依然相对稳定,且随着人均生产总值的提高,地区发展不平衡指数降低,这可能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经济收敛现象有关。模型(5)中加入了产业结构(IS_{it}),结果表明产业结构与发展不平衡指数在10%的水平上强正相关。

表2 全国层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CV				
LCV_{it}	0.9795*** (0.0266)	0.9990*** (0.0122)	0.9558*** (0.0228)	0.9511*** (0.0238)	0.9257*** (0.0286)
PCT_{it}	0.0019*** (0.0007)	0.0012** (0.0006)	0.0013** (0.0005)	0.0011** (0.0006)	0.0010** (0.0005)
K_{it}		0.0026*** (0.0009)	0.0003* (0.0002)	0.0004** (0.0002)	0.0029** (0.0015)
L_{it}		0.0003* (0.0002)	0.0026 (0.0043)	0.0024 (0.0047)	0.0058* (0.0034)
H_{it}			-0.0236*** (0.0071)	-0.0265*** (0.0077)	-0.0253*** (0.0052)
TFP_{it}			0.0525** (0.0211)	0.0497** (0.0239)	0.0458** (0.0229)
$PGDP_{it}$				-0.0055** (0.0028)	-0.0090** (0.0039)
IS_{it}					0.1134* (0.063)
_cons	0.0368*** (0.0114)	0.0261 (0.0182)	0.1245* (0.0669)	0.1475** (0.0751)	0.0983 (0.0853)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0.4184	0.4564	0.6912	0.6821	0.6942
SarganTest	0.9984	0.9537	1.0000	1.0000	1.0000
观测数值	352	352	352	352	352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据为各统计量的稳健标准误;AR(2)用于考察一次差分残差序列是否存在二阶自相关,其原假设是不存在自相关。下同。

(二)分地区层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

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分东中西三个地区再次就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以探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上的地区差异。表3中所有的回归结果都通过了AR(2)和Sargan检验,发展不平衡指数的一阶滞后项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说明发展不平衡指数具有持续性特征。

从表3中可以看到,中央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低于中部地区,在数量级上也小于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具体分析如下:在东部

和中部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并没有发挥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反而增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其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在数量上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小于中部地区,因此中部地区人均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显著性水平也高于东部;在西部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降低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但不平衡效应低于中部高于东部,原因可能在于西部地区存在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政府公职人员的业务素质相对较低,工作效率不高,难免会出现转移支付项目的低效率问题,同时公务员的收入在当地相对较高,存在一定程度的“寻租”现象。

同时,从表3的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本变量(H_{it})在模型(6)及模型(8)至模型(11)中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技术水平变量(TFP_{it})在模型(6)至模型(7)及模型(9)至模型(11)中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全国层面上人均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对经济发展不平衡具有明显的影响。

五、进一步的分析

(一)不同类别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分析

不同类别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可能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分别探究不同类转移支付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第一,中部和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东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为了弥补经

表3 分地区层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CV 东部		CV 中部		CV 中部		CV 中部		CV 西部		CV 西部	
LCV_{it}	0.9466*** (0.0274)	0.9502*** (0.0199)	0.8495*** (0.0446)	0.8785*** (0.0287)	0.8964*** (0.0388)	0.9087*** (0.0376)						
PCT_{it}	0.0019** (0.0009)	0.0017* (0.0012)	0.0045*** (0.0016)	0.0042** (0.0019)	-0.0041*** (0.0013)	-0.0039*** (0.0013)						
K_{it}	0.0002** (0.0001)	0.0014 (0.0019)	-0.0127** (0.0054)	-0.0146*** (0.0050)	0.0054 (0.0042)	0.0105** (0.0054)						
L_{it}	0.0062 (0.0061)	0.0040 (0.0046)	0.0154 (0.0095)	0.0203*** (0.0053)	-0.0096** (0.004)	-0.0095 (0.0071)						
PAS_{it}	-0.0011*** (0.0004)	-0.0018 (0.0124)	-0.0360* (0.0186)	-0.0292*** (0.0081)	-0.0319** (0.0124)	-0.0226** (0.0113)						
TFP_{it}	0.1071** (0.0431)	0.1020** (0.0458)	0.0332 (0.0996)	0.0359** (0.0165)	0.1124*** (0.0398)	0.1123*** (0.0261)						
$PGDP_{it}$			-0.0006 (0.0069)		-0.0028 (0.0202)							-0.0222** (0.0101)
IS_{it}			-0.1035 (0.0681)		0.2274** (0.0961)							-0.0608 (0.1575)
_cons	-0.1628 (0.1623)	-0.1152 (0.1387)	0.2261*** (0.0779)	0.0697 (0.0439)	0.1801*** (0.0546)	0.1477 (0.1023)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0.7786	0.2878	0.7896	0.9025	0.4483	0.3558						
SarganTest	0.9820	0.8847	1.0000	0.9964	1.0000	1.0000						
N	112	112	128	128	112	112						

表4 不同类别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分析的回归结果

变量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V 东部	CV 中部	CV 西部	CV 东部	CV 中部	CV 西部	CV 东部	CV 中部	CV 西部
$L CV_{it}$	0.9257*** (0.0462)	0.9054*** (0.0276)	0.9160*** (0.0259)	0.9427*** (0.0304)	0.8947*** (0.0154)	0.9255*** (0.0319)	0.9407*** (0.0278)	0.8925*** (0.0201)	0.9205*** (0.0275)
$CPCT_{it}$	-0.0096* (0.0057)	-0.0071** (0.0034)	-0.0021** (0.0009)						
$FPCT_{it}$				0.0137** (0.0064)	0.0052* (0.0032)	0.0092* (0.0051)			
$ZPCT_{it}$							-0.0101 (0.0063)	0.0052** (0.0025)	0.0017*** (0.0006)
K_{it}	0.0020 (0.001)	-0.0110** (0.0052)	0.0093* (0.0051)	-0.0025 (0.0016)	-0.0172*** (0.0045)	0.0059 (0.0104)	0.0025 (0.0020)	-0.0154*** (0.0045)	0.0107** (0.0052)
L_{it}	0.0097 (0.0113)	0.0174** (0.0068)	-0.0106 (0.0065)	0.0003 (0.0040)	0.0147*** (0.0040)	-0.0094 (0.0070)	0.0063 (0.0081)	0.0186*** (0.0057)	-0.0115* (0.0061)
H_{it}	-0.0057 (0.0137)	-0.0287*** (0.0101)	-0.0176** (0.0074)	0.0036** (0.0018)	-0.0221*** (0.0052)	-0.0170** (0.0076)	-0.0060 (0.0101)	-0.0254*** (0.0056)	-0.0185** (0.0079)
TFP_{it}	0.1438** (0.0068)	0.0370 (0.0536)	0.0899*** (0.0170)	0.1257 (0.0794)	-0.0337 (0.0359)	0.0831*** (0.0153)	0.1333* (0.0748)	-0.0015 (0.0361)	0.0922*** (0.0147)
$PGDP_{it}$	-0.0057 (0.0096)	-0.0028 (0.0211)	-0.0220* (0.0131)	0.0052** (0.0026)	0.0363*** (0.0114)	-0.0075 (0.0157)	-0.0062 (0.0068)	0.0155 (0.0096)	-0.0199 (0.0126)
IS_{it}	0.0272 (0.1169)	0.1174 (0.1332)	-0.0271 (0.1388)	-0.0875 (0.0534)	0.2262*** (0.0827)	0.0621 (0.1675)	-0.0524 (0.0567)	0.2066** (0.0828)	-0.0099 (0.1383)
$_{cons}$	-0.2751 (0.2910)	0.1172** (0.0551)	0.1259 (0.0864)	-0.1147 (0.1506)	0.0966 (0.0668)	0.0753 (0.1135)	-0.1256 (0.1808)	0.0933** (0.0423)	0.1239 (0.0893)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0.3081	0.7034	0.3608	0.34061	0.6423	0.3532	0.4281	0.7080	0.3457
SarganTest	1.0000	0.7295	0.7830	1.0000	1.0000	1.0000	0.9555	0.8186	1.0000
N	112	128	112	112	128	112	112	128	112

济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而设计,均等化特征更明显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确实起到了降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作用。第二,东中西部地区返还性收入的经济不平衡效应均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的显著性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可能在于返还性收入以税收返还为主,税收返还收入通常与地方政府的税收挂钩,经济发展程度更高的东部地区缴纳的税收更多,而相应取得的税收返还性收入更多,且其返还性收入占总的转移支付的比重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高。第三,中部和西部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东部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系数则为负且不显著,说明增加专项转移支付在中西部地区并没有降低地区发展不平衡指数,而东部地区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虽然不显著,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均衡地区差距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当前大多数专项转移支付往往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对公共资源的激烈竞争导致各地方政府往往抱着先把中央的钱拿到手,能否出得起配套资金之后再考虑的想法。经济发达地区很少出现无法配套的情况,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财力本来就吃紧,一旦中央政府硬化“预算约束”,地方政府便无法配套,进而就会出现转移支付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问题,最终导致当前推行的专项转移支付不利于缩小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能够满足专项转移支付的配套要求,且高素质人才集聚,政府公职人员素质较高,这使得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第四,通过比较一般性转移支付、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在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的系数大小我们可以发现,三类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据此可以推测,东部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另外,从全国层面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显著为负,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与三个地区层面的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根据地区层面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回归结果,我们推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方面的地区差异可能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形式有关。东部和中部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为正,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则显著为负,说明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抵消了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扩大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中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经济不平衡效应不及返还性收入和专项转移支付,总体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东部地区的返还性收入对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

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另外,我们通过分析2000—2016年东中西部地区各项转移支付的平均占比发现,西部地区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总转移支付的比重明显要比东部和中部地区高,这从侧面印证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降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有着重要作用这一结论。

(二)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不同类别发展不平衡效应分析

表5展示了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不同类别发展不平衡效应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组内和组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分别在

表5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不同类别发展不平衡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CVW全国	CVB全国	CVW东部	CVB东部	CVW中部	CVB中部	CVW西部	CVB西部
$L_{CVW_{it}}$	0.9210*** (0.0199)		0.9329*** (0.0327)		0.8402*** (0.0511)		0.9001*** (0.0259)	
$L_{CVB_{it}}$		0.8943*** (0.0378)		0.9577*** (0.0143)		0.9243*** (0.0249)		0.8769*** (0.0360)
PCT_{it}	0.0003* (0.0002)	0.0008*** (0.0002)	0.0003 (0.0002)	0.0014*** (0.0002)	0.0038* (0.0022)	0.0013** (0.0006)	0.0001 (0.0010)	-0.0017* (0.0009)
K_{it}	0.0002 (0.0022)	-0.0028 (0.0030)	0.0020* (0.0012)	-0.0007 (0.0017)	-0.0026 (0.0023)	-0.0116** (0.0054)	0.0086** (0.0041)	0.0011 (0.0065)
L_{it}	0.0012 (0.0037)	0.0046 (0.0051)	0.0020 (0.0038)	0.0027 (0.0030)	0.0100*** (0.0024)	0.0100*** (0.0034)	-0.0130* (0.0068)	0.0054 (0.0042)
H_{it}	-0.0057 (0.0044)	-0.0184*** (0.0044)	0.0054 (0.0106)	-0.0037 (0.0030)	-0.0144** (0.0065)	-0.0185*** (0.0047)	-0.0065 (0.0070)	-0.0198** (0.0100)
TFP_{it}	0.0281** (0.0128)	0.0176 (0.0150)	0.0526 (0.0367)	0.0502*** (0.0136)	0.0586 (0.0544)	-0.0119 (0.0210)	0.0490** (0.0194)	0.0678*** (0.0237)
$PGDP_{it}$	0.0005 (0.0027)	0.0076 (0.0054)	-0.0035 (0.0039)	0.0029 (0.0034)	-0.0231 (0.0182)	0.0112 (0.0092)	-0.0083* (0.0044)	-0.0119 (0.0136)
IS_{it}	0.0652 (0.0685)	0.0055 (0.0790)	-0.0613 (0.0858)	-0.0435 (0.0682)	0.1223 (0.0755)	0.1083*** (0.0297)	-0.0571 (0.0905)	0.0048 (0.1050)
$-cons$	-0.0059 (0.0634)	0.1184* (0.0643)	-0.0823** (0.0382)	-0.0333 (0.0453)	-0.0124 (0.0374)	0.0971*** (0.0363)	0.0754 (0.0658)	0.0913** (0.043)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R(2)	0.8013	0.5894	0.6100	0.7633	0.9032	0.6372	0.4633	0.5730
SarganTest	1.0000	1.0000	0.9984	1.0000	1.0000	1.0000	0.6173	0.9710
N	352	352	112	112	128	128	112	112

10%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中央转移支付没能在中心—外围城市之间及其各自内部进行合理分配,而是加剧了组内和组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其次,我们将 CVW_{it} (组内发展不平衡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发现,中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对组内发展不平衡指数的影响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东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组内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虽为正,但并不显著,且中部地区在数量级上大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说明中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没有起到缩小中心及外围城市内部经济发展差距的作用,转移支付在组内城市之间的分配上不合理。再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组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转移支付的组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西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对组间发展不平衡指数(CVB_{it})的影响则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增加西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缩小了中心和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据此我们推测西部地区各省域在对各市分配中央转移支付时,对外围城市有所侧重,平衡了中心和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则扩大了中心和外围城市之间的组间差距。最后,通过对比各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组内和组间发展不平衡效应的大小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组间发展不平衡效应要远大于组内发展不平衡效应,而中部地区则相反,说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心和外围城市之间中央转移支付的分配差距可能较大,存在中心经济发达城市获得的转移支付反而较多的“马太效应”,而中部地区则主要存在中心和外围内部城市之间中央转移支付分布不均的问题。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采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法计算得出2000—2016年各省区市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以2000—2016年中国22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研究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

展不平衡效应,回归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显著为正,即它加剧了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2)从分地区来看,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均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则显著为正。(3)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别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发现,一般性转移支付显著降低了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返还性收入则扩大了经济发展差距,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4)从不同类别的不平衡指数来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显著扩大了中部地区的组内发展不平衡程度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组间发展不平衡程度,缩小了西部地区中心与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基于所得结论,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地区结构。由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差异,因此对东部地区要重点采取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类型支付方式,逐年降低税收返还比重直至最终取消;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同时适当减少返还性收入。第二,优化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类别结构。考虑到税收返还与地方经济发展成正比,且不能有效促进地区平衡协调发展差距,故应当逐年减少其所占比重;针对专项转移支付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问题,应当建立严格的专项转移支付准入标准和条件,整合现有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对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严格审核评估,提高其使用效率,同时可以在不对产出水平造成太大影响的前提下,适当降低经济落后地区地方配套资金的比例。第三,在组内和组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各省区市应正确把握转移支付目标,在分配中央转移支付时应向具有更大财力诉求的本省域外围落后地区倾斜,同时均衡中心、外围城市内部发展差距,真正助力促进各地区组间和组内的平衡发展。第四,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使之成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助推器”。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提升明显有助于降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指数。一般性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的提升有赖于地区人力素质的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崛起也有赖于人才的集聚,而当前中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现象仍然不容小视,因此在协调地区发展和缩小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时应平衡地区间人力资本差距。

参考文献:

- [1] 周喆.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水平测度和成因探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2(2): 20 - 27.
- [2] 高帆.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空间”和“动力”双重因素分解[J]. 经济科学, 2012(5): 5 - 17.
- [3] 李实. 对基尼系数估算与分解的进一步说明——对陈宗胜教授评论的再答复[J]. 经济研究, 2002(5): 84 - 87.
- [4] Akita T. Decomposing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nd Indonesia using two-stage nested theil decomposition method [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03, 37(1): 55 - 77.
- [5] 刘学良, 田青. 关于基尼系数按群分解的进一步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9(10): 98 - 111.
- [6] 徐建华, 鲁凤.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尺度分析[J]. 地理研究, 2005(1): 57 - 68.
- [7] 覃成林, 张华, 张技辉.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及空间和产业的二重分解[J]. 中国工业经济, 2011(10): 37 - 45.
- [8] 陈长石, 刘和骏, 刘晨晖. 中国省际发展不平衡动因及变化解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5(11): 58 - 73.
- [9] Raiser M. Subsidizing inequality: Economic reforms, 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province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4(3): 1 - 26.
- [10] 刘生龙, 张捷. 空间经济视角下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性再检验——基于1985—2007年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12): 16 - 26.
- [11] 陈长石, 刘和骏, 刘晨晖. 金融市场化与地区发展不平衡: 规模主导还是效率主导[J]. 财贸经济, 2015(11): 40 - 58.
- [12] 陈长石, 丁胜. 产业结构偏离是否会导致省际经济发展不平衡?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7(5): 25 - 31.
- [13] 赵建国, 廖藏宜. 我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问题研究——基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的视角[J]. 宏观经济研究, 2015(8): 8 - 14.

- [14] 贾晓俊,岳希明.我国不同形式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效应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1):44-54.
- [15] 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J].经济研究,2012(5):45-57.
- [16] 马光荣,郭庆旺,刘畅.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J].中国社会科学,2016(9):105-125.
- [17] 钟辉勇,陆铭.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债务?[J].金融研究,2015(9):1-16.
- [18] 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3(4):799-822.
- [19] 宋小宁,苑德宇.公共服务均等、政治平衡与转移支付——基于1998—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8(4):92-97.
- [20] 吴永求,赵静.转移支付结构与地方财政效率——基于面板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财贸经济,2016(2):28-40.
- [21] Cashin P, Sahay R. Internal migration, center-state grant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tates of India[R]. IMF Working Papers.
- [22] Dias F, Silva R.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Portugal[C].44th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4.
- [23] 雷根强,黄晓虹.转移支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我国中西部县域数据的模糊断点回归分析[J].财贸研究,2015(12):35-48.
- [24] 马拴友,于红霞.转移支付与地区收敛[J].经济研究,2003(3):26-33.
- [25] 江新昶.转移支付、地区发展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财贸经济,2007(6):50-56.
- [26] 张楷滢.转移支付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收敛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09(13):27-28.
- [27]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115-143.
- [28] 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89-291.
- [29] 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10):17-31.
- [30] 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责任编辑:王丽爱]

A Research on the Unbalanced Effect of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on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

ZHAN Xinyu, BAI Chenxi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6 as samples, this paper uses the systematic GMM metho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unbalanced effects of central government on local transfer pay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1) Overall, the effects of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 payment on the imbalance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at is, it aggravates the imbalance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ransfer paymen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dex in western regions,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 effect of transfer payment per capita in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3) The transfer payment is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general, special and returnabl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ansfer paymen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 shows that general transfer payments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undable income has widened the ga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imbalance effe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pecial transfer payments. (4)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mbalance index, the central-to-local transfer payments hav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the intra-group development imbalance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group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narrow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peripheral cities of the western regions.

Key Words: transfer pay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 population weighted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system GMM estimatio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 public service; crowding-out effect